

此次「2018年海峡两岸外国语言文学论坛」由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和台湾淡江大学联合主办。大会论坛在台湾淡江大学于6月7日至10日举行，两岸学者共发表大会论文40余篇。大陆共有24名来自7所大学的专家学者参加。我院由我和文兵老师在大会论坛宣读了论文。我们受到了热情的招待和欢迎。同时文兵老师接受了台湾淡江大学法文系研究生的采访，我也应淡江大学学生组织的邀请评价和比较了两岸大学生的优点和应该相互学习的地方。同时，淡江大学是我从2000年到2017年工作的学校，这次故地重游，除了学术交流，还见到了不少老朋友，也交了不少新朋友，收获不少，感慨良多！最重要的比较确定的是：我们的参与加深了两岸学者对汕头大学的良好印象。我准备在暑假期间修改，整理以下我在大会上宣读的论文，以期达到将来发表的需要和条件。

## 从田纳西·威廉斯书信和笔记中看中国文化对他的影响

### 汕头大学文学院外文系

王绪鼎

“‘影响’这一概念应被视为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关键概念。”  
——韦斯坦恩（Weisstein）

本文以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理论为理论框架探讨东方文化对田纳西·威廉斯的影响。众所周知，影响理论是比较研究的核心。约瑟夫·T·肖（Joseph T. Shaw）指出：“在一些文学研究，尤其是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文学借鉴的研究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肖所提到的“文学借鉴”无疑是“影响”的另一个说法。同样地，亨利·H·H·雷马克（Henry H. H. Remak）指出：“影响研究不仅能增加我们的文学史知识，而且能增进我们对创作过程和对文学作品本身的理解。”著名的法国比较文学家梵·第根（Van Paul Tieghem）认为，归根结底比较文学是影响研究。但法国学派对影响研究的定义与美国学派的定义并不相同。法国学派把研究的重心放在事实联系上，将美国学派所包含的文学批评和平行研究排除在外。然而，正如曹顺庆所言：“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并不能取代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当今我们倡导的‘跨文化研究’，也并不能取代‘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时至今日，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涟漪结构的最内圈——‘影响研究’仍然有效，仍然在当日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大显身手，充满学术生命力。”因此，从2017年10月至12月，我将会运用法国学派的影响理论来建立田纳西·威廉斯与东方或中国文化之间的事实联系。项目细节如下文所示：

“传记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焦点，它和作家本人息息相关，而作家又是影响研究的开端所在。”  
——哈桑（Hassan）

根据比较文学中以梵·第根、J·M·伽列（Jean-Marie Carre）和M·F·基亚（M. F. Guyard）为代表的法国学派所青睐的影响理论，本文试图建立田纳西·威廉斯与东方或中国文化之间的事实联系。勒内·韦勒克（René Wellek）指出：“梵·第根以及他的前辈和追随者们用十九世纪实证主义的唯事实主义观点看待文学研究，把它只作为来源和影响的研究。”无独有偶，亨利·H·H·雷马克也写道：“法国人较为注重可以依靠事实根据加以解决的问题（常常要依据具体的文献）……接受、

媒介、国外旅行、一定时期内一国文学中反映出的对另一国态度等等问题。”显然，从一开始，法国比较文学学者就强调了比较文学中的文学影响，这种文学影响可以通过富有影响力的原始材料和受其影响的文学作品之间的事实联系建立起来。而这种事实联系必须通过媒介建立。比如阅读材料，尤其是阅读个人文件（包括日记、笔记、自传和其他传记资料）中所展现的外国旅行经历和译作。我将引用事实信息设法证明田纳西·威廉斯的确受到东方或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些事实信息来自于田纳西·威廉斯的日记、笔记、回忆录、采访、信件、传记、报纸报道以及他的数次东方之旅，尤其是他两次到东方的长途旅行。这两次旅行均历时三个月，第一次是在1959年秋天，而第二次是在1970年秋天。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田纳西·威廉斯已经从他的外祖父母那儿培养出一种优良的文化品位。他的外祖父母很爱他，在他的一生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他曾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外祖父的文化品位：“他喜欢丝绸手帕和漂亮的茶杯这类东西。”自然而然地，威廉斯为他们所影响，尤其是为他们精致的文化品位所影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威廉斯对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在他的一生中不断增长。首先，威廉斯的外祖父“尊敬的沃尔特·埃德温·戴金（Reverent Walter Edwin Dakin）”是“一位贵族”，也是“一位博学的自由派牧师”。和他的外祖父一样，威廉斯对具有东方风情的东西很感兴趣，比如山东丝绸、精致的茶杯、美丽的中日海报和玉器。但和外祖父相比，威廉斯更多的是通过阅读来熟悉东方的文化，这让他积累了不少东方文化的知识。在大学时，他就开始对中国古典诗歌产生兴趣。他被李白诗歌中桀骜不羁和浪漫精神深深打动，大声地给他姐姐罗斯（Rose）朗读李白的浪漫主义诗歌。在1935年02月02日给约瑟芬·W·约翰逊（Josephine W. Johnson）的一封信中<sup>1</sup>，威廉斯表达了他对李白浪漫主义诗歌的热情：“我想和热爱诗歌的人分享这些诗。上周，我把这些诗读给我姐姐听，她那时正在织毛衣，听着这些诗歌，却还能一针不差地继续织着，这让我觉得这么做是在白费精力。”<sup>2</sup>

不久以后，在1935年三月下旬写给约翰·鲁德（John Rood）的一封信里，田纳西·威廉斯不仅再次引用了李白的《夜宿山寺》，还引用了李白另一首关于庄周（公元前约369-286年）梦蝶的诗：

庄周梦胡蝶，胡蝶为庄周。  
一体更变易，万事良悠悠。

约翰·鲁德（John Rood）是《手稿》（*Manuscript*）的编辑，他退回了威廉斯所提交的故事《蓝玫瑰》（“Blue Roses”）、《他父亲的房子》（“His Father’s House”）和一部现已无法得知的剧作。威廉斯试图借中国古典诗歌给编辑鲁德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所引用的关于李白庄周梦蝶的诗可能是他在东方哲学道路上燃放的第一道心灵火花，这点燃了他对中国道教大师庄子的热情。威廉斯曾读过庄子著作的这一事实后来在丹·艾萨克（Dan Isaac）的采访中得到证明。谈及对威廉斯的采访时，丹·艾萨克说：“当我走进他宾馆房间的时候，我第一眼就看到了默顿（Merton）的译著《庄子之道》（*The Way of Chuang Tzu*）……虽然那儿还有一些其他作品，比如劳伦斯·弗林盖蒂（Lawrence Ferlinghetti）和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sup>3</sup>的诗集，但是他显然正在读关于庄子的《内在宁静

<sup>1</sup> 约瑟芬·W·约翰逊（Josephine W. Johnson）曾代表美国圣路易斯作家协会（St. Louis Writers’ Guild）颁发给年轻的威廉斯短篇小说大赛一等奖。当时威廉斯获奖的参赛短篇小说为《斯黛拉明星》（“Stella for Star”）。

<sup>2</sup> 据玛格丽特·布雷汉姆·桑顿（Margaret Bradham Thornton）记载，1935年01月末，威廉斯给他姐姐罗斯（Rose）朗诵的李白浪漫主义诗歌，是小畑熏良（Shigeyoshi Obata）翻译的英译版《拟古十二首（其九）》，《将进酒》，《夜宿山寺》和《山中问答》。《拟古十二首（其九）》源出李白《古风五十九首》。

<sup>3</sup> 比如劳伦斯·弗林盖蒂（Lawrence Ferlinghetti）和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都是美国著名诗人，而后者还是一个虔诚的禅宗佛教徒。

之源》(*Inner Sources of Serenity*)。”威廉斯本人也承认，1959年秋天那三个月的东方之旅对他影响重大。正如《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所报道的那样：“他说两年前的东方之旅让他对东方哲学印象深刻。”甚至在威廉斯启程前往东方之前，W·J·韦瑟比(W. J. Weatherby)在《曼彻斯特卫报周刊》(*The Manchester Guardian Weekly*)的文章中已经预言了威廉斯这趟朝圣之旅会有丰硕的收获：

威廉斯很快就要动身前往远东，开始他大概六个月的旅程——目的地包括日本、香港和中国（‘如果他们允许我入境的话’）。田纳西·威廉斯慧眼中的远东风情似乎预示着百老汇的又一个丰收，一个具有东方神秘色彩的丰收。

令人敬佩的著名威廉斯批评家艾伦·黑尔(Allean Hale)在评论威廉斯1969年的戏剧《在一家东京酒店的酒吧》(*In the Bar of a Tokyo Hotel*)时也指出，威廉斯已经研究东方宗教很久了：“然而，十多年来，威廉斯一直在研究东方宗教。在这些受能剧启发而创作的剧作里我们可以看出，当威廉斯担心自己要疯时，他似乎一直在佛教或道教文化中寻找着绝对真理。”虽然西方学界经常把道教看作是一个宗教，但是在中国文化中，道教更多地被看作是一门哲学。而在我的研究中，我自始至终认为道教是中国古老、永恒且具有无限生命力的哲学。上文提及的这些证据直接或间接地揭示了，威廉斯的确读过《庄子》(*Zhuang Zi*)。众所周知，《庄子》是道家两大关键哲学著作之一（另一著作当然是老子的《道德经》了）。这两部经典无疑是道教的基石。如果说老子是道教的创始人，那么庄子就是道教当之无愧的第一位大师。这是中外皆知的事情。对威廉斯来说，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威廉斯对中国诗歌的兴趣并不只是一时的热情。1940年09月20日，在写给戏剧协会(Theatre Guild)的一封信里，威廉斯把修订版的《天使之战》(*Battle of Angels*)和中国浪漫主义古典诗歌作比较。他在比较当中所用到的延伸明喻和优美的暗喻，明显反映出他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热爱：

我现在正在进行大量的写作。在我修订长篇戏剧《天使之战》时，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发生了。它像许多高雅中国诗歌其中之一，像一个个圆圆的纸球，直到你把它们扔进一杯暖茶中，它们就如鲜花般舒展开放，然后绽放开的纸页另一面有内容豁然出现在眼前。这就是我在修订《天使之战》过程中的感受。”这或可以证明威廉斯声称的《天使之战》中的诗意可能有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子。

的确，威廉斯的这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比较，清楚地反映出他不仅热爱中国古典诗歌感人至深的精神，还对它们的艺术手法、美学价值、高雅情操有着深刻的理解。他似乎也特别钦佩诗人们丰富多彩的想象力和诗中生动的意象。作为一位已有诗歌、戏剧及短篇小说作品问世的青年作家，威廉斯发自内心地喜欢浪漫主义诗歌。1941年09月28日，威廉斯在和他的一位年轻朋友比尔·理查兹(Bill Richards)小聚时，再次展现了他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浓厚兴趣：“我们读着诗，我大声地朗诵弥尔顿、济慈、克莱恩、中国的诗歌，它们是那么的美妙。”

除了中国古典诗歌以外，威廉斯还很喜欢其他蕴含着东方文化价值的事物。在他的自传和传记中，我们轻易就能发现他对中国文化日益增长的兴趣。在他的笔记(*Notebooks*)中，他曾经记录过1943年10月31日星期天，在洛杉矶唐人街的一次愉快之旅：“今天和简(Jane)还有托尼(Tony)去了埃尔维拉(Elvira Street)和唐人街。虽然和他们去购物极其累人，但是我们一路笑闹着，偶尔也愉快地就地歇息……我买了一张好看的中国海报，把它挂在了我的房间里……感觉非常好……托尼说我就是个‘中国佬。’”毫无疑问，威廉斯对这次旅行幽默的描述，清楚地显示出他对中国文化的着迷，而且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说他像“中国佬”的玩笑显然取悦了他。

在他早年的生活和文学事业中，威廉斯写出了“中国湖面上的一朵睡莲”这样清新的，诗一般的明喻表述。他非常喜欢这一明喻表述，在自己的自传和文学作品中用了不下六次。这个明喻表述第一

次出现是在他于 1946 年 04 月至 1948 年 02 月间写就的短篇小说《鬣蜥之夜》（“The Night of the Iguana”）中。第二次是在他 1948 年出版的剧作《夏与烟》（*Summer and Smoke*）中。1951 年 10 月 2 日，他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吃下了一颗耐波他（镇静药），不知道它会不会让我感觉自己像中国湖面上的一朵睡莲呢？”1953 年 12 月 29 日，他再次写道：“让他们给我注射一针外加三颗速可眠，然后再来几杯威士忌。虽然这么做是不对的，但我开始感觉自己像是阿尔玛小姐那朵躺在中国湖面上的睡莲了。”作为《夏与烟》的重写版，1965 年出版的《怪癖的夜莺》（*The Eccentricity of a Nightingale*）依旧保留了这一明喻表述。除了在《怪癖的夜莺》中，这个明喻表述和喝白兰地相关外，在其他场景中，这个表述都和镇静药物相关。但无论如何，这个明喻表述显然让威廉斯和他笔下的角色们感受到无与伦比的愉悦和全然的放松；而且，这一明喻表述明快地折射出了平静、清新、神秘的内涵，它既表现了威廉斯对中国异国他乡的遐想和憧憬，也呈现了他独创了一个别具一格的、令人神往的、诗一般的意象。显而易见这些都在他诗人的想象中扎下了根，也帮助他在丰富想象的世界里建构了一个神秘的国度，而此国度建基于神秘的中国文化、历史和哲学。

1953 年 04 月 22 日，在写给玛丽亚·布里内娃（Maria Britneva）的信中，威廉斯对他工作室装潢和氛围的描述，明显地表现出他对东方文化的浓厚兴趣：

基韦斯特工作室（The Key West studio）！太好看了！天窗处悬挂着精美漂亮的竹帘，外面的棕榈树、香蕉树和树叶类似羊齿植物的澳大利亚松树守护在四面墙上的窗户外，一盏日本灯笼挂在我头顶上方，灯笼下面悬挂着透明玻璃吊坠，在不息的风中叮当作响……棕榈树和芭蕉叶摇曳，它们发出的声音美妙极了，就像是穿着真丝裙子的淑女们赤脚在楼下跑动的声音，光影不断闪烁……一把属于哈特·克莱恩（Hart Crane）的扇子<sup>4</sup>、贝壳等，形成了我独处的安详和而平静。

这段对于他在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的房子朗朗上口又诗意般的描述，带着浓厚的日本和中国文化氛围。虽然那盏悬挂着玻璃吊坠的日本灯笼是日本文化的象征，但是，威廉斯提及的“精美漂亮的竹帘”和他所用的那个优美的明喻“像是穿着真丝裙子的淑女们赤脚在楼下跑动的声音”，却是中国文化中所具有的优雅文化现象。很显然，这些极具东方风情的文化意象让威廉斯十分激动，并陶醉其中。

威廉斯对东方文化的着迷并没有渐渐淡去，与之相反，在他闻名于世后，他对东方文化的着迷反而日益增长。在威廉斯开始 1959 年秋天那场东方之旅前，他便经常打算要去那儿，尤其是当他经历个人危机时，或是当他因为批评家们对他新作品的攻击而郁郁寡欢的时候。他常常想往通过东方之旅去寻求心理压力释放、探索灵魂归宿以及治疗精神创伤。1947 年 03 月 28 日，威廉斯经历了一场个人危机：他和相恋一年多的恋人潘乔·罗德里格斯·Y·冈萨雷斯（Pancho Rodriguez y Gonzales）<sup>5</sup>分手了。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我过得足够好的话，我会去欧洲——或者中国。”假设句中“如果”一词清楚地表明了他当时过得并不好，而在他的潜意识中，他是想要去欧洲或者中国这样有着厚重历史文化底蕴的地方，来驱赶他内心的阴霾。这何许暗示在他心底里，他似乎认为，能治愈他灵魂创伤的神秘之境是一方理想中的文化净土。显然，威廉斯想要寻求灵魂慰藉，而这一想象中的神秘去处应是东方或中国。1954 年 06 月 07 日，他写道：“如果有一天我决定放弃坚持创作，我想我会去东方……我认为‘中年人，去东方’是个好主意。”威廉斯的这段话明显透露出他对东方的向往，而他向往的

---

<sup>4</sup> 哈特·克莱恩 Hart Crane (July 21, 1899 – April 27, 1932) 是著名美国诗人。威廉斯公认克莱恩对他及他的诗歌和剧作影响巨大。

<sup>5</sup> 潘乔·罗德里格斯·Y·冈萨雷斯（Pancho Rodriguez y Gonzales）曾是威廉斯的同性恋恋人。他们在 1946 年至 1947 年，交往了一年多。

显然是东方厚重的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博大精深的儒、释、道精神，而绝非任何物质的东西，因为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东方比美国要穷得多，所以东方不可能给人们提供比美国更好的物质生活。但是中年人们能在东方感受到其深厚的文化价值，尤其是精神层面的价值。威廉斯可能相信，东方这样一个有着悠久的历史、历史和智慧的地方，会是他解除精神重压、获得内心宁静和灵魂慰藉的好去处。1957 年三月末，威廉斯因批评家们对《琴神下凡》（*Orpheus Descending*）的负面评论而十分沮丧，他再次想到要跑到东方去：“戏剧批评界屠杀了《琴神下凡》。但我依旧认为这部剧作具有诗意之美。开幕的那天晚上，我收拾行装，准备到香港去。可惜我没把这疯狂的冲动进行到底——我最后还是再次回到了迈阿密的‘塔楼’去了。”

法国学派注重建立事实联系（*rapport de fait*）。而本文第一层事实联系是威廉斯与中国文化（包括中国古典诗歌和道家文化）之间的事实联系。如果上述例证可以证明第一层事实联系，那么以下的证据亦能佐证第二层事实联系——威廉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与他对多幕剧《鬣蜥之夜》的创作和改写之间的事实联系。第一个重要的例证便是，威廉斯刚结束他三个月的东方之旅，便开始了《鬣蜥之夜》的创作。他的终生挚友玛丽亚·圣尤斯特（Maria St. Just）把这一例证准确无误地记录下来：“田纳西和弗兰克（Frank）结束了三个月的环球旅行，回到基韦斯特过冬。田纳西正忙于创作《鬣蜥之夜》。”这段话中的“环球旅行”指的是威廉斯 1959 年秋的东方之行。上文也提到过，威廉斯后来告诉《纽约时报》：“在这次东方之行中，东方哲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东方之行不仅让“他对东方哲学有深刻印象”，还恢复了他的创作活力和精神活力。虽然唐纳德·斯波托（Donald Spoto）指出威廉斯的创作已经强力复活了，但是他没有给出明确详细的解释：

虽然东方长途旅行和后来在纽约的那一个月让威廉斯筋疲力尽，但是他的精神和意志忽然爆发了新的生命力，就像他正在履行自己的新年夙愿一样……他致力于创作《鬣蜥之夜》——许多人都认为这将会成为威廉斯最后一部伟大的剧作。”

三个月的东方之旅让威廉斯的创作活力和精神活力突然复苏。于威廉斯而言，东方总是有着异国情调的、萦绕不去的、神秘的吸引力。威廉斯不仅渴望去探索东方那令他着迷的文化，而且也渴望着领悟东方哲学中的玄机。在威廉斯的自传、回忆录、书信集等材料中，几乎所有与东方相关的段落，都暗含着极具东方风情的文化价值观和高雅的品味。以上这些与东方相关的例证所反映出的文化上和精神上的外延意义，都能证明威廉斯希望在东方寻求某种精神上的慰藉，而非任何物质上的满足。而 1959 年秋天的东方之旅，让威廉斯找到了他长期渴望的东西。这趟旅行不仅慰藉了他的灵魂，而且还给他带来了精神上的启发，让他的创作活力回归、复苏、重新迸发。所以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趟东方之旅促成了他精神上的蜕变，激发了他创作的新灵感，带来了他艺术生涯的新生。而对此最好的证明就是他随后马上成功地创作了他另一部伟大的获奖剧作《鬣蜥之夜》。而这一力作充满了东方和中国之隐喻和象征。而这些隐喻和象征对形塑剧中的主要人物和建构剧中的主题，甚至对整个剧情的发展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1959 年秋这趟东方之旅对威廉斯的影响的确非常深远，以至于使他经常荡气回肠地回顾此次旅行，并总惦记着重温旧旅。1970 年秋威廉斯终于又成功地重温了旧旅。1970 年 9 月 29 日，在他第二次为期三个月的东方之旅中，威廉斯给玛丽亚·圣尤斯特写的信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我正在香港等着奥利弗（Oliver）<sup>6</sup>，他是一个永不会满足的看客，还想在日本多去几个地方看看……托尼·史密斯曾经说过我就是个“中国佬，”我觉得他说得很对。我感觉我在中国的确就像在家里一样，中国人也像是把我当作他们回家来省亲的同胞……我想，

<sup>6</sup> 奥利弗·埃文斯（Oliver Evans）是一个英语教授和诗人。他是威廉斯的一位密友。威廉斯在 1970 年秋天为期三月第二次去往东方的旅行，正是由他帮忙安排的。

那指引我又来到东方的直觉非常正确。”

27年过去了，威廉斯还清楚地记得托尼·史密斯在1935年他们去洛杉矶唐人街时所说的玩笑话：他是一个“中国佬”。这无疑进一步证明了威廉斯对中国文化的着迷。威廉斯在香港感觉到“就像在家里一样”，且中国人把他当作“回家来省亲的同胞”。这些表达不仅说明了威廉斯长久以来对中国文化的憧憬终于得到满足，也说明了威廉斯自然而然地沉浸于中国文化之中。显然，他对中国人的亲切感和中国人对他热诚的态度，鼓舞着他更深入地探索中国文化。通过在东方之旅中对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的探索，威廉斯的身体、灵魂和创作精神都渐渐复苏，他1970年10月03日写的信便是极好的证明：

没有人，没有人像我一样这么地热爱生活。七年来，我一直都在精神困境之中备受煎熬，现在，是时候把这些煎熬都抛开，去感受我生活中每一个瞬间所蕴含的全新的、深刻的感性愉悦。霍尔瑟（Horse）<sup>7</sup>还在世的时候，给予我许多生存的力量。自从他去世后，我便一直沉溺于一种无意识的，渴望死亡的念想，并最终向这个念想低头。现如今，我已经完全克服了这个魔咒似的念想，为了生活，我要像老虎一样奋斗。从我还活着的事实中，从旅途之中，从认识和爱着像你和奥利弗这样的人的过程中，甚至从世界这一边的许多（充满爱的）陌生人当中，我每天都能得到精神财富和满足。”

东方便是威廉斯信中的“世界的这一边”。这封信写于以香港半岛酒店抬头的信纸上，而香港正是威廉斯第二次东方之旅的中途站，因此，此处“（充满爱的）陌生人”自然是指中国人。这封信清楚地显示出，威廉斯这趟东方之旅治愈了他的身体，重新焕发了他的能量，让他对待生活的态度积极起来，也让他的创造力又复苏了，还重燃了他的斗志。他决心不再被批评家们对他新作品的攻击吓倒。

和1959年秋第一次东方之旅一样，1970年秋威廉斯第二次为期三个月的东方之旅也具有同样重要性。源自于两次旅行的东方文化和哲学的重要性都出现在他后期剧作中。换言之，在他后期剧作中，都有东方文化，东方宗教和东方哲学的痕迹。这显然得益于他的两次东方之旅。这将在后面部分中详细论述。

回顾过往，我们还可以断定，1959年秋天他的第一次东方之旅也有和他第二次东方之旅同样的作用和功效。因此，威廉斯“的精神和意志忽然爆发了新的生命力”可能并不仅仅是唐纳德·斯波托所说的那样，只是“正在履行自己的新年夙愿”；威廉斯的变化更多地是因为他第一次为期三个月的东方之旅。尤其在他这趟旅行归来后，他立马就开始了多幕剧《鬣蜥之夜》的创作。而充满中国文化及哲学隐喻和象征的《鬣蜥之夜》是如此的成功。这一事实也证明了中国文化的确对威廉斯本人及剧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sup>7</sup> 霍尔瑟（Horse）是弗兰克·梅洛（Frank Merlo）的昵称。弗兰克·梅洛是陪伴了威廉斯十六年的至交好友。1963年09月，弗兰克·梅洛因为肺癌逝世。